

區域研究與學科導向的中國研究： 以當代東亞所學術社群的英文著作為例

摘要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東亞所)建立於1968年。當時是因為在冷戰格局下，中國大陸對台灣存在著高度威脅，台灣政府需要培養對中國大陸的情報蒐集與分析的專業人才，因此建立了該單位。在冷戰結束後，這項因素已經不再需要，加上台灣高等教育環境的改變，因此東亞所也轉向學術研究。從這五十年的發展上，東亞所的中國研究，區域研究與學科導向之間。本文以《The China Quarterly》、《The China Journal》與《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這三份知名的中國研究期刊為例，去討論東亞所學術社群發表在這三份期刊的文章，所呈現出的內容與特色，並討論東亞所在學術發展所面臨的挑戰與對策。

關鍵字：中國研究、東亞所、知識社會學、區域研究、學科導向

The China Studies that Melds Area Studies with Disciplinary Orient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works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f the Contemporary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Abstrac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of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1968. Its genesis lay in the then Cold War when Mainland China posed high threats to the survival of Taiwan, thus necessitating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to cultivate professionals for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intelligence from Mainland China.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such a factor became unnecessary, and together with the changes in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environmen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also turned its attention to academic research. From these 50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China studies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has melded area studies with disciplinary orient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ree well-known China studies journals, *The China Quarterly*, *The China Journal*, an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as examples, discussing the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f the Institute in them, and also the challenges it has faced in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the measures taken to meet such challenges.

Keywords: China Studies,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Sociology of Knowledge, Regional Studies, Disciplinary Orientation

壹、前言

1959 年，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成立後的第四年。作為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奠基者，費正清早有預見地指出當代中國研究領域的準則：「一場偉大的革命，也許是歷來最大偉大的革命……，所有既往的中國歷史看起來已面目全非……現在，除了中國之外，我們還必須研究共產主義與蘇維埃的關聯。」¹ 自此之後，與傳統的漢學研究者不同，一批新的具社會科學訓練、主要從事比較共產主義中國與蘇維埃盟友關係的中國問題專家，從此開始研究 1949 後的中國。

若與當代中國研究社群的學術困境相較，讀者或許會發現歷史情境何其驚人的類似。1980 年代後中國改革開放的崛起，如何使研究方法跟上中國的「鉅變」，以成為學者日日夜夜的挑戰。不同世代的中國研究者，在研究取向雖有不同的代際差異，²但問題的癥結並未改變：「如何正確地解讀中國」，或者說正視中國崛起對學科理論的挑戰。就此角度觀察，類似臺灣在中國研究位置的相關討論，我們能發現臺灣的研究社群，在歷史進程與過程，並未擺脫與西方研究者同樣的困境。³

回首臺灣在海外中國研究上的位置，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以下簡稱：東亞所）的創立，曾有其重要歷史定位。東亞所創立至今，歷經五十年光景，常被認為是臺灣在中國研究領域上的學術基地與人才培育庫。但隨著國際冷戰格局的鉅變，東亞所特有的兩岸地緣優勢與人文風貌，已隨著海外中國研究社群的蓬勃發展，日不復見。近年來東亞所的知識社群以過去的歷史傳統與新興的社會科學方法，爭取更多的國際能見度。本文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觀察當代東亞所學術社群，即曾在東亞所獲得學位的畢業生和曾在東亞所任教的老師，出版國際期刊論文的成果。本文同時認為，中國研究的發展始終在區域研究與學科導向的衝突中。這不單是國際學術體系面對的困境，也是東亞所當前得面對的挑戰。本文希望能了解東亞所在國際社群的位置，並藉此探索這個社群未來發展的利基。這也是本文最深切的學術關懷。

¹ 費正清的這段陳述最初見於他在向福特基金會遞交建立研究機構的申請書上，這段歷史可見於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紀念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成立 50 周年學術研討會」發表的〈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一文。不過，在後續刊載於《The China Journal》的文章上，在前言有關費正清對中心成立宗旨的引言已被刪除。但相關討論仍可見於裴宜理的會議初稿。此外，「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共經歷過三次更名，最初稱為「東亞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後來為了紀念費正清而改名為「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在 2007 年才改名為現今的名稱，以彰顯其中國研究的特長。這場會議論文發表內容，可見裴宜理著、劉平譯，〈「告別革命」與中國政治研究〉，《思與言》，第 44 卷第 3 期（2006 年 9 月），頁 231-291。

² Kenneth Lieberthal, "Reflection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a Field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Allen Carlson, Mary E. Gallagher,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elanie Manion, eds.,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New Sources, 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³ 李宗義、張弘遠、許雅淑，〈社會學與中國研究：臺灣的位置（1955-2005）〉，《東亞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頁 33-74。

以下，本文將分成五個部分。除前言外，第二節介紹海外中國研究與東亞所兩個知識社群的發展歷程與差異。在第四到七節聚焦在東亞所知識社群在國際中國研究社群的學術表現，並以《The China Quarterly》、《The China Journal》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三分期刊的發表，分別簡述其發表內容與成果。在第八節，我們除總結並歸納這些英文著作的利基點，並嘗試找出東亞所學術表現在國際社群應有的位置，以及東亞所未來所面臨的挑戰。

貳、知識社會學的視野：海外的中國研究與東亞所知識社群

知識社會學認為思想與知識社群的生成，鑲嵌於社會環境之中。知識社會學重視知識形成的「外在因素」，包含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的影響。發展知識社會學的重要奠基者謝勒(Max Scheler)就曾指出，知識的產生具有其同步性結構，存在於各年代、各地域之中。⁴當吾人在探究知識產生的同時，尚需理解知識內涵必定鑲嵌於歷史脈絡，切莫脫離知識在本質上所處的外在環境。

何漢理(Harry Harding)、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等學者檢視西方中國研究社群的發展路徑後，皆指出中國研究社群在研究議題與方法途徑上，出現明顯的代際差別。⁵何漢理將中國研究社群分為三個世代：第一世代學者受早期冷戰氛圍的影響，研究視角集中於問題式分析。第二世代學者集中討論1960-1970年代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巨變，及其產生的影響。此外，極權主義的模型的分析視角常用於解釋中國政治。第三世代學者則恰逢改革開放年代，他們的學術訓練與接觸中國的機會，遠遠優於前二代學者，能運用更好的研究方法，對中國有更深刻的了解。

近來，部分學者如歐博文(Kevin O'Brien)對這種代際遞移帶來的典範轉移深感憂慮。歐博文認為新一代的中國研究學者著迷於數理計量模型，且不再熱衷於和中國研究同行對話。由於各學科開始熱衷中國議題，反而使得中國研究社群出現「去中心化」的趨勢。⁶其他學者如甘思德(Scott Kennedy)、羅德明等人則對中國研究社群這類方法論「快速趕超」的趨勢，抱持比較樂觀的態度。他們認為中國研究議題和方法論的創新，不單能為政治學提供更多養分，也能提供更

⁴ 關永中，〈謝勒知識社會學的背景－文化社會學〉，《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0期（2004年5月），頁265-296。

⁵ Harry Harding,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in David Shambaugh ed.,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3), pp. 14-40.

⁶ Kevin J. O'Brien,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in an Age of Specializ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0, No. 71 (July 2011), pp. 535-541.

多不同的視角來理解中國。⁷這些不同觀察明海外中國研究社群已面臨「社會科學」(學科導向)與「區域研究」之間取舍的轉捩點。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在討論代際差異產生的方法論衝突時，提出一個有趣的視角。作為北美歷史最久的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他指出「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成立的宗旨與目標，本來就是為了引入當時新興的比較政治、共產主義途徑等社會科學方法，去研究中國。⁸ 在裴宜理的觀察，中國看似眼花撩亂的政經情境，仍有許多過去歷史(甚至是革命時期)的制度遺緒，如何使用創新的方法，找出這類「矛盾點」，才是突破這類研究困境的旨趣所在。

事實上，這種學術關懷的視野，或也能和東亞所的知識社群發展，做一對照。政大東亞所的成立背景，與臺灣中國研究社群的發展，可謂緊密鑲嵌。臺灣的中國研究社群歷經數次轉變。每一階段皆與當下的國內外政經局勢有關。在冷戰時期，臺灣的中國研究討論，曾長期被「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及培育下轄研究人員的政大東亞所寡占。在當時，政大東亞所更以「匪情研究」名目，奠基的豐厚的歷史遺產，甚至成為領先西方中國研究知識社群的重鎮。1968年東亞所的成立，對於培養對大陸情勢研判的工作人員，貢獻甚大。當時國關中心(及下轄政大東亞所)，培養人才目的雖然仍重視對大陸的敵情分析與政策研判，但學術色彩已漸為濃厚。此外，劉曉鵬更特別指出，這些機構的設立除了政策目的，更有學術研究的需要。⁹ 就此而言，這與「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當時的成立背景比較，或有類似之處。

在近期，東亞所除面臨政策智庫與學術研究的轉型困境外，海外社會科學化的浪潮，同樣侵蝕著其根基。東亞所歷史見證了臺灣中國研究知識社群，從匪情研究轉至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軌跡。林碧炤認為，臺灣的中國研究發展歷經傳統匪情研究、轉型時期與社會科學化時期。¹⁰楊開煌則就研究對象與取材，將臺灣

⁷ Lowell Dittmer and William Hurst, "Analysis in Limbo?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mid the Maturation of Reform," *Issues & Studies*, Vol. 38, No. 4/ Vol. 39, No.1 (December 2002/March 2003), pp. 11-48; Scott Kennedy, "Overcoming Our Middle Kingdom Complex: Finding China's Plac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Scott Kennedy, ed., *Beyond the Middle Kingdo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hina's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Lily L Tsai,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Issues of Political Sensitivity in Rural China," in Allen Carlson et al. eds.,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New Sources, 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46-265..

⁸ Elizabeth J. Perry,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 *The China Journal*, No.57 (January 2007), pp. 1-22.

⁹ 劉曉鵬，〈敵前養士：「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前傳，1937-197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2期（2013年12月），頁145-174。

¹⁰ 簡郁芳，〈一個新道途：中國研究在臺灣的發展－專訪國立政治大學副校長兼國關中心主任林碧炤博士〉，《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第二期（2004年3月），頁17-21。

的中國研究區分為匪情研究、中共研究與中國大陸研究等三階段。¹¹寇健文就指出，在 1990 年代末期，影響東亞所朝向社會科學發展的因素，除了國際中國研究學群的方法論轉向，另一個因素在於台灣高教環境變遷，特別是強調國際化的期刊發表機制、大學學術評鑑與頂尖大學計畫，促使各大學投入大量資源與人力，尋求適當的國際學術地位。¹² 從一個廣泛角度思考，海外與臺灣的中國研究社群，面臨的問題都是相同的。值得注意的是，東亞所的知識社群，確實也利用了既存優勢，突破現實困境，在海外發表取得一定水準。

總的來說，從知識社會學的面向來看，東亞所的學術發展於區域研究與學科導向的光譜之間。其受到國際冷戰格局、美國學術發展的轉變，以及國內對大學評鑑要求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我們可以將相關內容整理於表 1。

表 1 兩種學術典範的比較

	區域研究	學科導向
研究途徑	歷史、文件分析	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
形成背景（國際因素）	冷戰格局的東西對峙	冷戰結束，以及社會科學的發展
形成背景（國內因素）	對中共鬥爭的需要	大學學術環境的改變
著作發表的場域	區域研究的專屬期刊	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的期刊
學術旨趣	重視中國特色與脈絡	淡化中國特色，將之放置在國際比較的視野

參、東亞所「黨政研究」在國際「中國研究」的表現

為了呈現東亞所知識社群與國際「中國研究」社群的差異與互動過程，表 2 統計 2011 至 2018 年為止，東亞所知識社群在國際「中國研究」頂尖期刊的出版趨勢。在以下三節，我們會對這些研究出版品進行內容分析，探討其中呈現的方法途徑與細部課題。為聚焦討論主題，本文所採取的篩選步驟主要下：第一，論文篩選主題除限於中國研究外，也涵蓋兩岸關係、國際政治等議題。第二，我們涵蓋的知識社群對象，除東亞所現任的專任教授外，還包括了臺灣、中港等地主要大學與研究機構政治學相關系所中畢業於東亞所的中國研究學者。¹³ 第三，

¹¹ 楊開煌，〈臺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東吳政治學報》，第 11 期(2000 年 9 月)，頁 71-105。

¹² Chien-wen Kou,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aiwan's China Studies: Trajectories and Dynamics," *Issues & Studies*, Vol.50, No.1 (March 2014), pp.9-53.

¹³ 除任教於東亞所的學者外，表 2 幾乎涵蓋中港臺等地大學與研究機構政治學相關系所學歷背景，是畢業於東亞所的學者但可能仍有相關疏漏，如任職於非政治學相關機構的中國研究學者。此外，統計範圍除包含中國研究外，部分主題為兩岸關係、國際政治的論文也納入統計。譬如兩岸關係議題的近年發表可見 Shu Keng, Jean Yu-Chen Tseng, and Qiang Yu, "The Strengths of China's Charm Offensive: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a Southern Taiwan Town under

我們檢證的論著是以科技部「臺灣政治學門在國際期刊出版現況」討論有列入的「中國研究」英文刊物為基礎，¹⁴並參照 2018 年度區域研究國際期刊的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篩選出 3「中國研究」領域具代表性的刊物，前後時間延伸（2000 至 2018 年），共計 23 篇研究論文。¹⁵

這三分期刊分別是《The China Quarterly》、《The China Journal》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在 2018 年的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分別是 2.276、2.25、1.575，是區域研究類別「中國研究」主題，影響係數最高的前三名刊物。這些期刊都採取了雙向匿名審查制，且具備一定學術格式，皆收錄在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名單，其論文也在業內評價都具備一定水準。在海外的中國知識研究社群，這三分期刊的歷史也別具代表性，以《The China Quarterly》為例，他是海外討論中國研究議題最早創辦的刊物，由現任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於 1960 年創辦，在中國研究期刊的影響係數中，長年盤踞首位。本文將以每篇論文為單位，在下三節討論東亞所知識社群在這三分期刊的發表情況。而初步觀察，東亞所知識社群在這三分期刊的發表，有以下特色：

第一，東亞所知識社群在這三分期刊的發表，自 2013 年後，歷年有增長趨勢，每年平均發表數有 3.1 篇，可能說明東亞所在歷經社會科學化的轉型趨勢後，在學術對話上日漸能與國際社群接軌。第二，從論文發表數在這三分期刊的分布觀察，研究刊載於《The China Journal》的比例最高，共有 10 篇。《The China Quarterly》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各有 6 及 7 篇。但可能也說明作為海外中國研究知名度最高的期刊《The China Quarterly》，審查機制確實最難。在《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則可能偏好國際政治、政策分析意涵較高的論文。此外，在《The China Quarterly》5 篇發表論文中，有一篇獲得《The China Quarterly》當年度頒發的年度最具創意論文獎（Gordon White Prize），顯示東亞所知識社群，確實有潛力向國際研究社群，產出具原創性的發表。第三，這幾篇論文，有朝向幾個特定議題集中的趨勢，譬如中共黨政組織與機構、黨史議題也占一定比重。

Attack from Chinese Economic Power,”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32 (December 2017), pp. 956-981; Yu-Shan Wu, “Theorizing on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Nine Contending Approach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9, No. 25 (November 2000), pp. 407-428; Yu-Shan Wu, “Taiwa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China Journal*, No.53 (January 2005), pp. 35-60 等。國際政治議題的發表可見 Chih-Yu Shih and Chiung-Chiu Huang, “Preaching Self-Responsibility: the Chinese style of glob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2, No.80 (March 2013), pp.351-365.

¹⁴ 黃紀，〈臺灣政治學者在國際期刊之出版現況〉，《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七卷第一期（2005 年 12 月），頁 41-51。

¹⁵ 在論文數計算上，我們以中港臺等地大學與研究機構網站，學者的官方簡歷論文發表情況為準，我們並納入在這三分期刊已允許刊登，但尚未正式出版的論文。要注意的是，在本文以下各節期刊發表的討論上，尚未出版的論文暫不予討論。

具體而言，這可能也反映東亞所知識社群，尋求海外發表的潛在優勢，我們於下節分別探討。

表 2 東亞所知識社群歷年中國研究頂尖期刊的發表數（黨政研究，2000-2018 年）

期刊	發表年度																			總計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CQ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1	1	0	2	0	6
CJ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2	1	2	0	1	3	10
JCC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2	2	7

備註：1. 僅計算東亞所相關學者論文於該分期刊的當年發表數。

2. CQ 是《The China Quarterly》的簡寫，CJ 是《The China Journal》的簡寫，JCC 是《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的簡寫。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肆、東亞所社群在《The China Quarterly》的發表狀況

在本節，我們討論東亞所知識社群在《The China Quarterly》近年的發表方向。首先，我們會簡介《The China Quarterly》的刊物發展史。再來，則說明東亞所知識社群近年於這分期刊的發表，並分析歸納大致的方向。

《The China Quarterly》創辦於 1960 年，是由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負責編務，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現任主編是 Tim Pringle，他目前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教，研究領域集中勞工運動、發展研究。創刊主編為知名文化大革命史學者馬若德。他是國外第一份專門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術刊物，起初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自由文化基金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CCF）出資運營。在 1967 年，自由文化基金會解散，該刊移交由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營運。馬若德後來回憶《The China Quarterly》的刊史，認為這次事件標誌了刊物的編輯方向從此由政策分析，走入區域研究、社會科學等議題的重大轉向。¹⁶ 在 1970 年代後，該刊成為海外中國研究領域的標誌性刊物，並偏好收錄具原創性、研究課題在領域具前沿趨勢的論文，在收錄論文中，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史的發表也具一定比重。

以下，我們概述東亞所知識社群近年在該刊的發表趨勢。鍾延麟 2011 年的論文，是他在《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一書出版前，對鄧小平研究的探索。在過去的研究中，鄧小平在「反右傾」運動的角色甚少被討論。這篇論文指出，鄧小平領導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實際上有效且嚴格監督了這場政治運動的進程。此外，該文還為中央書記處在文革前中共政治體制的角色，

¹⁶ See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a Quarterl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43 (September 1995), pp. 692-696.

提供了一個案例研究。大體上，在鄧小平就任總書記入主書記處後，其職能與機構大幅擴編，有助於了解中央書記處在中共建政初期的發展。¹⁷ 蔡文軒等人 2013 年的論文揭開中共宣傳體制「寫作組」制度的面紗。寫作組制度起源於 1960 年代中蘇論戰期間，當時負責起草論戰所需的大部分文章。目前人民日報有完整的寫作組制度，負責傳播中宣部制定的思想和政策。此外，根據作者對內部人員訪談，不同寫作組的「筆名」，隱晦地體現作者的派系屬性與立場，使基層官員能通過識別這套隱晦的「政治密碼」，洞悉黨內的內部爭論。¹⁸ 蔡文軒等人 2014 年的論文則探討中共政治一個有趣的現象，即為何有些地方省份的改革實驗總是成功，為何有些省分總是失敗。本文提出一個概念，在最小化風險前提下，中央領導層與地方省委書記存在政治默契，「實驗點」的推動與擴大必須有中央的足夠支持。地方的經濟條件也影響改革實驗的類型，譬如富裕省份的領導人傾向於提升「行政效率」的改革措施，確保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相對落後的省份，領導人無法奢望經濟一夕之間騰籠換鳥，反而會推動「社會維穩」的實驗。¹⁹

蔡文軒與寇健文 2015 年發表文章則探討中共「後備幹部」制度。這項制度體現中共選拔接班人的標準和程序，在晉用的政治級別（遵循梯隊接班原則），與政治周期（歷年全國黨代會前晉用，黨代會後培訓）都存在慣例。篩選接班人則有三個原則：年齡、政治忠誠與執政評比。本文並認為，這些後備幹部可說是中國共產黨的門徒（disciples），在捍衛官方意識形態上提供了後盾。²⁰ 寇健文 2017 年的作品討論習近平時期中共「黨軍關係」（Party-military relations）出現的重大變化。解放軍長期在中共政治體制，有其重要地位。在習近平主政後，呈現了權力集中於單一文職領導人的趨勢，並有以下特徵：1. 重新強調軍委會主席負責制。2. 成立跨部門的協調機制，大規模改組軍事指揮系統。3. 大規模的高階將領調動，並任用親信等。具體而言，這是因為後革命世代領導人與高階將領間，存在大型組織經常面對的委託代理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因此習近平透過前述作法降低委託代理問題發生的風險。然而，風險很難完全消除，未來習近平仍將面對許多不確定因素。²¹

耿曙與曾于綦等人在 2017 年發表的文章，從「易感群體」的概念對於兩岸關係的交流進行研究，案例則是台南市的學甲區，探討大陸經濟惠台政策是否能

¹⁷ See Yen-lin Chung, "The Witch-Hunting Vanguard: The Central Secretariat'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6 (June 2011), pp.391-411.

¹⁸ See Wen-Hsuan Tsai and Peng-Hsiang Kao, "Secret Codes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The Unknown System of Writing Team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14, (June 2013), pp. 394-410.

¹⁹ See Wen-Hsuan Tsai and Nicola Dean, "Experimentation under Hierarchy in Local Conditions: Case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Guangdong and Sichua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ol. 218 (June 2014), pp. 339-358.

²⁰ See Wen-Hsuan Tsai and Chien-wen Kou, "The Party's Disciples: CCP Reserve Cadres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a Resilient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hina Quarterly*, ol. 221 (March 2015), pp. 1-20.

²¹ Chien-wen Kou, "Xi Jinping in Command: Solving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 CCP-PLA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No.232 (December 2017), pp.866-885.

夠影響台灣民眾之政治態度。學甲區一直是民進黨堅定的支持者，但 2009 年莫拉克颱風之後，當地虱目魚養殖業受到重創，加上既有的產銷結構問題，為大陸推動對台經濟政策提供了機遇。在北京的政治主導下，一些大陸著名企業也相繼簽署了相關「契作協定」，為當地漁民帶來新收入。研究結果發現單靠經濟利益的給予，並不能提升當地民眾對大陸的好感，還需再配合正面友好形象的塑造。換言之，經濟因素僅是必要條件並非充分要件，惠台攻勢還需其他條件配合才能影響台灣民眾政治態度。²²

檢閱東亞所知識社群在《The China Quarterly》發表的論文後，我們歸納出一些特色，或許能反映這份期刊在收錄發表的偏好方向。一、中共黨政機構與制度的議題仍是重心，但更喜好對現有制度有獨創性觀察的作品（如對寫作組在中共宣傳體制的地位為何、或對地方政治實驗的多樣性提供解釋）。二、具有歷史視野的分析能提供更多研究縱深（如鍾延麟在 2011 年的發表，實際上兼顧黨史議題的新見解、並揭露中央書記處早期罕為人知的組織運作）。三、研究具創新意義更佳（如後備幹部制度的發現，有利於理解中共的接班人栽培機制），為海外中國研究社群提供更多未來的研究課題。

伍、東亞所社群在《The China Journal》的發表狀況

我們在本節討論東亞所知識社群在《The China Journal》近年的發表方向。我們首先簡介《The China Journal》的刊物發展史，再來說明東亞所知識社群近年近年在這份期刊的發表情況，並歸納特徵。

《The China Journal》創辦於 1979 年，刊物前身為《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Studies》。該刊由澳洲國立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創辦並負責編務，²³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澳洲國立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被認為是當今最具水準的中國研究中心之一。譬如《The China Quarterly》前主編沈大偉就認為，該中心的學術水準、及澳洲的中國研究水準在僅次於海外中國研究重鎮美國，《The China Journal》這這份刊物的國際知名度帶動澳洲在海外中國研究的知名度。²⁴ 此外，早期刊物刊登的文章偏好中共黨史，近期則關注社會學議題。現任主編為安戈（Jonathan Unger）與陳佩華（Anita Chan），他們目前都於澳洲國立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任職。安戈的研究議題包括中共政治與黨史、中國的社會分層、農村轉型等領域。

²² Keng, Tseng, and Yu, "The Strengths of China's Charm Offensive", pp. 956-981.

²³ 澳洲國立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與澳洲國立大學在 2010 年成立中華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存在合作關係。

²⁴ 〈西方學者視野中的國外中國問題研究——訪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人民網》，2010 年 06 月 12 日，檢索時間：2018 年 9 月 11 日。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38903/138911/11863217.html>>。

陳佩華則包括中國的勞工議題、工會與維權、早期曾研究紅衛兵世代的政治社會化過程。自 1990 年後，他們兼任刊物主編至今，並在 1995 年刊物更名為現今名稱，持續擴張《The China Journal》在國際的影響力。

以下，我們簡述近年東亞所知識社群在該刊的發表情況。吳玉山 2005 年的文章討論 2004 年臺灣總統大選後，國內政治因素對兩岸關係的影響。該文認為，基於選票極大化的政治邏輯，2004 年大選前後，各政黨在意識型態光譜上都出現顯著轉變。他以經濟整合、統獨偏好兩個意識形態立場為二維象限，分析各黨的光譜位置。具體來說，這兩個光譜反映民眾心理的長期變化、兩岸經貿關係的轉變等兩個國內政治因素。選舉周期則使得各黨必須隨時調整意識形態位置，以獲取選票。這是臺灣 1980 年代末期民主化後的直接後果。²⁵

鍾延麟 2013 年的論文聚焦於鄧小平在大躍進運動時期的角色。在毛澤東的充分授權下，鄧小平實際推行與監督這項運動的進程。本文認為應重估鄧小平在這場運動的角色與責任，及為中共政治帶來的負面影響。²⁶ 他在 2015 年的論文以彭真為研究對象，認為學界看待彭真在與毛澤東關係上存在誤差。彭真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與北京市最高領導人，在文革前一直擁護毛的路線，大躍進時期「反右傾」運動、全民大煉鐵和人民公社熱潮，皆積極響應。再者，過去研究多將彭真定義為劉少奇的忠誠追隨者。本文卻揭示當 1962 年中共高層對大躍進路線出現分歧時，彭仍堅持與毛澤東相同的觀點。直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期，彭與毛才分道揚鑣。這也與他在大躍進時期表現無關。²⁷

蔡文軒等人在 2013 年發表的文章提出中共政治體系可稱為一個「學習型」政黨。這個「學習型」政黨的概念源自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為了維持黨內的路線正確，宣稱黨應變成一所「無期大學」，為此構建了一套學習機制。一旦黨內出現分歧，中共高層運用各類學習與閱讀的討論活動，統一黨內意見。在改革開放後，黨內「學習」內容雖大有改觀。譬如為了協調高層對改革的引導，政治局層面的「學習」會議越來越多邀請講者，討論經濟和法制議題。但這類學習會議事實上由黨內的中央辦公廳與中央政策研究室設定討論議題，並由總書記定案。在「學習」過後，最終由中央書記處下放「學習」型文件，至各級黨委，最終意見事實上也講者無關，而是高層「統一意見」的產物，該文因此認為這類會議仍保留毛澤東時期的特色。²⁸

²⁵ Yu-Shan Wu, "Taiwa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China Journal*, No.53 (January 2005), pp. 35-60.

²⁶ See Yen-lin Chung, "The CEO of the Utopian Project: Deng Xiaoping'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ina Journal*, No.69 (January 2013), pp.154-173.

²⁷ See Yen-lin Chung, "The Unknown Standard-Bearer of the Three Red Banners: Peng Zhen's Role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ina Journal*, No.74 (July 2015), pp.129-143.

²⁸ Wen-Hsuan Tsai and Nicola Dean, "The CCP's Learning System: Thought Unification and Regime Adaptat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69 (January 2013), pp. 87-107.

蔡文軒等人在 2015 年的文章揭露中共高層體制的「秘書政治」。政治秘書與領導人的關係極為緊密，並為其建立極為私密的訊息管道。作者認為這層非正式關係為秘書晉升提供了許多政治資本，但為中共政治的制度化帶來更多不穩因素。²⁹ 蔡文軒在 2017 年的文章則討論罕為人知的中共高層的喪禮儀式。作者認為，中共高層善透過安排重要政治人物的治喪規格、不同等級的黨內評價，表達對其的歷史定位。透過這類儀式性的安排，當政者能夠鞏固政權的合法性。亡者的死亡儀式，似乎更是獻給獨裁者的一場政治表演。³⁰

寇健文與蔡文軒在 2014 年的文章則對中共的菁英甄補制度提出「小步快跑」的概念。在幹部晉升時，級別的「年齡限制」是不少幹部仕途更上一層樓的阻礙。礙於黨政領導幹部的任期制規定，幹部必須通過「逐級晉升」向上流動。然而，幹部若要滿每一職務的完整任期，一個 30 歲的副科級幹部，從基層晉升至正國級領導人，年齡將達到 75 歲。在現實的高層政治中，這種高齡化的現象在 1990 年代後就極為罕見。作者認為，要破解這種幹部升遷的年齡困境，只有制度晉升有某些「快車道」，才能解決以上問題。該文就此提出三種繞開年齡限制的策略：共青團晉升、掛職鍛煉與破格提拔。這三種策略為中共幹部的年齡困境，提供部分活化效果，但擾亂正常的幹部晉升程序，為中共幹部晉升的制度化帶來潛在的負面影響。³¹

總結來說，東亞所學術社群在《The China Journal》發表的文章有下列特色，或能理解這份期刊的偏好。一、除了願意刊登中共黨史議題的新聞釋外，也刊登對菁英政治的獨創觀察。二、對中共高層互動中的非正式政治（如秘書政治、高層喪禮儀式）有高度興趣。三、願意刊登對各類正式制度（如政治高層學習會議的作用、菁英政治的「小步快跑」晉升）有新意的研究發現。

陸、東亞所社群在《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的發表狀況

在本節，我們討論東亞所知識社群近年在《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的發表情況。首先，我們會簡介《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的刊物發展史。再來，說明東亞所知識社群近年於這份期刊的發表，並分析歸納大致的趨勢。

²⁹ Wen-Hsuan Tsai and Nicola Dean, "Lifting the Veil of the CCP's *Mishu* System: Unrestricted Informal Politics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hina Journal*, No. 73 (January 2015), pp. 158-185.

³⁰ Wen-Hsuan Tsai, "Framing the Funeral: Death Ritual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 *The China Journal*, No. 77 (January 2017), pp. 51-71.

³¹ Chien-wen Kou and Wen-Hsuan Tsai, "'Sprinting with Small Steps' towards Promotion: Solutions for the Age Dilemma in the CCP Cadre Appointment System," *The China Journal*, No.71 (January 2014), pp.155-17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創辦於 1992 年，是本文分析的三份期刊之中創辦時間最晚的刊物，影響力指數近年提升很多。該期刊由現任美國丹佛大學美中合作中心（Center for China-U.S. Cooperation, University of Denver）主任趙穗生創辦，並由美中合作中心負責編務至今。趙穗生創刊初期就將方向定位於政策研究，以便和其他兩分歷史悠久的刊物區別，還強調將社會科學途徑與中國研究議題結合。³² 整體而論，這份刊物偏好政策分析與國際政治主題的作品。

東亞所知識社群近年在該刊的發表情況大致如下。吳玉山 2000 年的文章是兩岸關係研究的回顧型論文(review article)。這篇文章首先提出兩岸互動、國內政治與國際環境三種分析面向，據此提出了九種相關的研究途徑。這九種途徑分別是分裂國家模式、整合理論、大小政治實體模式(power asymmetry model)、選票策略極大化模式(vote maximizing model)、發展型國家典範、戰略三角模式、國際體系理論、政治心理學與認知理論。該文分析這些途徑的優缺點之後，也指出它們為當年的兩岸關係現況提供多元的分析視角。³³ 石之瑜與黃瓊萩在 2013 年發表論文提出一個中國模式的全球治理概念——宣揚自我責任(preaching Self-Responsibility)。作者認為，基於不同的政治文化傳統，包括儒家文化的不干預傳統與自治理念、強調說服的社會主義集體倫理、參與國際組織的不佳經驗等，中國模式的全球治理將更強調義務與改革、勸說與示範（而非公開制裁），來維護全球領導的地位，與西方典範不同。³⁵

蔡文軒於 2016 年的論文探討中共於近年新興的網絡威權主義（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與近年熱門的中國網絡輿論審查議題對話。作者認為，中共在網絡技術的運用上已有效強化其對網絡言論的控管，從而達到威權鞏固的目的。³⁶ 蔡文軒等人 2017 年的文章揭露甚少被討論的「領導批示」制度。該文透過公開資訊與訪談，梳理了領導批示制度的運作秘密。所謂領導批示，是各級領導寫在下級呈報公文、材料的批語，用於審批具體事項，傳遞自己對於某些事項的看法和意見。但這類公文呈報到上級機關，不是每份都能得到高層青睞。公文能否得到批示，很大部分取決於領導秘書，領導秘書一般根據領導分工的「歸口原則」

³²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在中美學界架起一座橋樑〉，《新京報網》，2018 年 08 月 20 日，檢索時間：2018 年 9 月 11 日。<<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18/08/20/500168.html>>。

³³ Yu-Shan Wu, "Theorizing on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Nine Contending Approach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9, No. 25 (November 2000), pp. 407-428.

³⁵ Chih-Yu Shih and Chiung-Chiu Huang, "Preaching Self-Responsibility: the Chinese style of glob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2, No.80 (March 2013), pp.351-365.

³⁶ Wen-Hsuan Tsai "How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 was Operationalized in China: Methods and Procedures of Public Opinion Contro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 No. 101 (September 2016), pp. 731-744.

進行文件分發，如果某份材料涉及到多個領導的分管領域，那麼辦公廳的秘書還要決定文件究竟應該給哪些領導閱批。³⁷

王韻等人 2018 年的論文探討習近平時期的統一戰線工作。本文認為政治協商會議代表的中國式協商式民主 (consultative democracy) 機制，仍有重要作用。此外，在 18 大後，中共的統戰工重新整合，包括部門的重組與人事任命，都有新風貌。包括省級統戰部門擴編、團派政治新星的流入等，都活化了習近平時期的統戰工作。與過去相比，中共對少數民族、宗教事務的控管能力得到強化。不過，這種強化和整合統戰工作的模式未來仍須面對執政合法性的問題。³⁹ 張鈞智與趙建民在 2018 年發表的文章分析近年全國人大的轉變。作者認為，全國人大在政治體制中扮演更專業化的角色。實證指標包括社會菁英參與程度的提升、任期制的硬性規定與立法能力增強的改變。不過，作者也指出，受到黨國體制與成員資格等因素影響，全國人大的自主性仍然受到限制。⁴⁰

詳細檢閱東亞所學術社群在《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發表的文章之後，我們可以歸納出一些特色，間接了解這份期刊的偏好。一、政策制訂過程的研究較易獲得青睞。二、與當前政治現象、新興政治議題有關的作品較能得到關注。三、在本文分析的論文中，三份期刊在兩岸關係與國際政治議題上共刊登三篇文章，其中兩篇就刊登這份期刊（參考下節表 3）。這說明了該刊確實有偏好國際政治議題的跡象。

柒、東亞所在「中國研究」的國際位置：傳承與創新

在本節，我們首先嘗試回答一個問題：東亞所學術社群在國際中國研究社群究竟佔據了什麼位置？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更深入分析這些論文所屬的議題領域。透過歸納的方式，我們更能理解這個知識社群在國際發表的優勢所在。

本文透過議題領域與期刊的交叉分析，呈現前述問題的答案。（表 3）議題領域包括以下幾類：菁英政治、中共黨史、黨政制度與機構、幹部甄補、中央與地方關係、輿論控制與宣傳工作、統一戰線工作、黨軍關係、兩岸關係與國際政治。因某些論文可能橫跨數個議題領域，所以領域的篇數總和超過論文發表的總數。根據表 3，不同領域確實出現明顯落差。在黨政議題方面，尤其是菁英政治

³⁷ Wen-Hsuan Tsai and Xingmiu Liao, "Concentrating Power to Accomplish Big Things: the CCP's Pishi System and Ope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6, no. 104 (March 2017), pp. 297-310.

³⁹ Ray Wang and Gerry Groot, "Who Represents? Xi Jinping's Grand United Front Work, Legitim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nsult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7, No. 112 (February 2018), pp. 569-583.

⁴⁰ Chun-chih Chang and Chien-min Chao, "Specialization without Autonomy: An Informational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Permanent Committees in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forthcoming).

與黨政制度與機構議題，遠高於其他領域的論文數量。其次，中共黨史研究仍佔據一定分量。這兩點共同反映政大東亞所長期累積的學術傳統使得這個社群在探討菁英政治的互動、共黨政制度與機構分析時，能提供更多制度細節和具歷史縱深的分析。最後，在《The China Quarterly》、《The China Journal》兩份期刊中，涉及菁英政治與黨政制度與機構議題的文章比較多，說明社群的相關研究獲得一定程度認可。此外，從特定議題的角度，如探討中共的輿論控制與宣傳、統一戰線、黨軍關係等研究也有部分斬獲。這些文章大致關心習近平時期的政治變革，但這些改革仍保留部分的政治傳統，如毛澤東時期的特色。另一個值得注意現象是兩岸關係與國際政治的議題，與其他偏黨政議題相較，在發表數量上並無太大差別。

表 3 領域與期刊的交叉分析（2000-2018 年）

次領域	論文總數	期刊名		
		The China Quarterly	The China Jour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菁英政治	12	5	6	1
中共黨史	3	1	2	0
黨政制度與機構	13	5	4	4
幹部甄補	3	1	1	1
中央與地方關係	1	1	0	0
輿論控制與宣傳工作	2	1	0	1
統一戰線工作	1	0	0	1
黨軍關係	1	1	0	0
兩岸關係與國際政治	4	1	1	2

說明：某些論文可能屬於一個以上的次領域。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觀察，我們可以說「傳承與創新」是東亞所知識社群取得國際位置的利基。首先，高度重視黨史的元素。正如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曾經指出的，中國「革命傳統」大量因素，是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關鍵。同樣地，這類革命傳統也讓中共政權維持高度的適應性。⁴¹ 東亞所知識社群的英文作品大致延續了同樣的思路，兼顧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揉合，是其一大特色。

其次，結合西方社會科學的分析方法，研究菁英流動長期趨勢。這類具體研究成果可見於寇健文自 2003 年建立的「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http://cped.nccu.edu.tw>）。這個資料庫收集中國大陸政治菁英的基本資料，包括姓名（中文與羅馬拼音）、年齡、出生地、族別、生歿時間、學歷、工作經歷、

⁴¹ Elizabeth J. Perry,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 *The China Journal*, No.57 (January 2007), pp. 1-22.

入黨時間，以及參加工作時間等等項目。目前收錄範圍包括 1949 年以後迄今曾任副部級以上之黨政軍群幹部，合計超過 4000 位以上退休或現任幹部。同時，這也是過去政大國關中心在「匪情研究」時期，以研究者自身經驗為基礎去分析中共菁英，轉變成從資料去建構當代中共政治菁英生命史，可算是另一種延續。

第三，歐博文擔心的中國研究受到專業學科影響，導致主題「碎片化」問題，在東亞所知識社群中並不存在。歐博文認為，西方中國研究的長期歷程有兩大特色：一是課題化，另一為學科化。由於各社會科學學科（如政治學、社會學與經濟學等）開始關心中國議題，不同學科的中國研究者更傾向與所屬學科對話，較少與整個中國研究的知識社群對話。具體造成的風險是沒有任何一個「碎片」（課題）能夠完整拼圖出中國情境的真實全貌。其次，中國研究容易在這樣的過程中喪失特殊性。

歐博文指出：「我們這些研究中國的學者不再跟以前一樣在區域研究期刊上相互切磋。相反的，我們致力於跟那些研究其他國家的社會資本、民眾抗爭、腐敗問題、政治信任、產業鏈條的學科同行對話。我們的目標讀者在變化，我們越來越把精力放在取悅學科同行上，而不是強調我們的研究發現對於理解中國有什麼意義。」⁴² 持平而論，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創新，西方的中國研究社會確實更傾向與專業學科本身對話，這對向西方取徑的臺灣中國研究知識社群而言，可為一種警示。歐博文其實是對新一代西方中國研究學者在區域研究的基礎訓練不足，感到憂慮。例如研究者更強調的是學科訓練與方法論，但對於中國的政經演變或歷史背景不夠熟悉。從事計量分析的學者可能不需要實地觀察，便可以取得大量資料，逕行分析。

不過，以上問題在東亞所的學術訓練傳統下，比較不是問題。一是臺灣具有中華文化圈的優勢，類似的西方語言文化造成的知識落差問題相對較小。二是過去「匪情研究」歷史傳統，使這個社群在解讀政治高層的菁英互動、關係掌握，可能僅次於中國本土出身的海外學者。三則是東亞所在課程安排上，仍是少數強調中共黨史、意識形態等課程教學的研究機構。這些訓練為我們爭取當前中國研究的創新發現時，提供部分優勢。

進一步而論，當前國際中國研究知識社群面對的專業學科或區域研究之間，兩者孰輕孰重的爭議，以前也曾經出現過。最早期的中國研究學者堅持漢學導向，後來比較共黨研究與社會科學方法的抬頭，使得中國的獨特性開始被質疑。⁴³ 近來，更多新興研究方法不斷出現，如隨機實驗法、準實驗研究設計等，或巨量數

⁴² Kevin J. O'Brien,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in an Age of Specialization," pp. 535-541.

⁴³ Elizabeth J. Perry,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 pp. 1-22.

據分析的抬頭（Gary King 等人一系列對網絡輿論控制研究的方法推展），⁴⁴ 再度引起部分研究者的憂慮。究竟是專業學科與方法創新優先？還是區域特殊性優先？這類類似的討論。若回到中國研究最先回答的問題上，即「如何正確地解讀中國」，以上的爭論或可化解。專業學科（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與區域特殊性的角度，兩者都不宜偏廢，並應相輔相成。區域研究可能過去重視某一地域的史實、情境、文化與特色，忽略學理性的創新。社會科學若過於流入科學與量化方法的洪流，而忽略一些歷史事件與體制運作的細節，可能出現有漂亮但失真的研究結果。事實上，研究取材與方法的選用並無優劣之分，端視研究議題的需要而進行選擇。惟如何從中國的實際經驗出發，正確有效的理解「中國」，是研究者應當思索之課題。⁴⁵

捌、結論：東亞所的未來與挑戰

本文以「知識社會學」的角度，討論政大東亞所與國際中國研究的連結與差異。首先，我們認為，國際中國研究與東亞所知識社群同樣面對中國巨變，在發展進程中都不斷出現典範轉移。在歷史進程與過程，臺灣的研究社群並未擺脫與西方研究者同樣的困境。其次，我們以「中共黨政研究」為例，呈現兩個知識群的差異與互動過程。東亞所的當前知識社群利用了既存的歷史遺產，在國際期刊上發表。最後，我們嘗試回答一個問題：東亞所的知識社群，在國際研究社群，究竟能佔據什麼角色。在菁英政治、黨政制度與機構、黨史研究等領域中，合計出版的國際期刊論文總數仍遠高於其他領域。這反映東亞所長期歷史累積下的學術傳統，使得我們在探討菁英政治的互動、共黨政制度與機構分析，能提供更多制度細節。

總結來說，東亞所繼承的「匪情研究」血脈，很大程度是讓台灣在國際中國研究社群上，能取得一定的地位。許多東亞所相關學者主要的投稿場域，例如《The China Quarterly》、《The China Journal》與《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都屬於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範疇，比較偏向區域研究的期刊，並不屬於政治科學或社會學等學科導向（discipline oriented）的領域。這對於東亞所社群的發展來說，或許是一個警示。這象徵著東亞所傳統透過黨史資料、文件詮釋與質化研究的路術，可能受到區域研究的學者所欣賞，但不被學科取向的新興研究者所認同。這些學科取向的研究者，更趨於量化統計與理論導向，而對於「中國故事」不見得有太多興趣。⁴⁶

⁴⁴ 參見 Gary King,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1, No. 3 (July 2017). pp. 484-501.

⁴⁵ 王信賢，〈當代西方「中國研究」之新制度典範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43 卷第 8 期（2000 年 8 月），頁 44-45。

⁴⁶ 根據筆者近年來投稿的經驗，從審查意見給的評價來看，審查人可以區分為區域研究出身與學科導向出身的兩類。前者基本上給筆者不錯的意見，但後者對筆者論文的評價就不高，認為論文

這無疑是進一步壓縮了東亞所學術社群的論文發表空間。面對這個挑戰，筆者認為有幾個可以思考的方式來面對。首先，是不能偏廢過去的傳統與路術。東亞所知識社群的強項在於黨史與文件判讀等訓練，這是台灣在中國研究上獨樹一格的特色。在以美國政治學為主流所掀起的量化浪潮下，東亞所吸收西方社會科學知識之際，應同時強化傳統研究取向的價值。

其次，與相關學科導向的學者進行合作，透過質性與量化方法的交融，讓研究的視角更為全面。舉例來說，中共黨報用語與暗碼的研究若能結合「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或「爬蟲技術」(crawler technology)，透過電腦的程式輔助，向中共官網或電子媒體來抓取相關字彙，進行大數據的分析，則可以讓中共黨報的用語規範做出更為清晰透徹的研究。⁴⁷這種跨學科的學術合作，也是東亞所學術社群可以考量的作法。

東亞所五十年的發展，可說是台灣中國研究的縮影。從匪情研究到現今的學科導向研究，東亞所的研究路術已經逐漸多元，但仍保有匪情研究傳統中，重視歷史資料與文件判讀的特色。未來，在區域研究與學科導向的選擇上，筆者以為東亞所不可偏廢過去的路術，也就是繼續在區域研究的範疇內繼續茁壯，並設法讓西方學界對於區域研究的價值性，予以重新重視。此外，也可以和更多的學科合作，讓傳統的區域研究添加上更多科學性的方法。東亞所知識社群絕不可抱殘守缺，但也不能自廢武功，而必須尋求一條穩健妥當的發展道路，繼續引領台灣的中國研究，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參考文獻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在中美學界架起一座橋樑〉，《新京報網》，2018年08月20日，檢索時間：2018年9月11日。

<<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18/08/20/500168.html>>。

〈西方學者視野中的國外中國問題研究——訪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人民網》，2010年06月12日，檢索時間：2018年9月11日。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38903/138911/11863217.html>>。

王信賢，〈當代西方「中國研究」之新制度典範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43卷第8期（2000年8月），頁44-45。

的理論貢獻與因果關係都不足。更值得警惕的是，即便是《The China Quarterly》等區域研究的期刊，有越來越多的比例已經開始邀請學科導向訓練的學者擔任審查人。

⁴⁷ 這方面的研究，國內學者諸如陳至潔等人已經有相關的文章發表。相關著作，參見 Titus C. Chen and Chia-hao Hsu, "Double-Speaking Human Rights: Analyzing Human Rights Conception in Chinese Politics (1989–201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7, No. 112 (2018), pp. 534-553.

- 李宗義、張弘遠、許雅淑，〈社會學與中國研究：臺灣的位置（1955-2005）〉，
《東亞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頁 33-74。
-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與質性分析：原始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臺灣政治
學刊》（第 9 卷第 2 期），頁 233-278。
- 黃紀，〈臺灣政治學者在國際期刊之出版現況〉，《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
七卷第一期（2005 年 12 月），頁 41-51。
- 褚填正，〈當代中國學在臺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的肇基與嬗遞（1968-2015）〉，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2015 年）。
- 楊開煌，〈臺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東吳政治學報》，第 11
期（2000 年 9 月），頁 71-105。
- 裴宜理著、劉平譯，〈「告別革命」與中國政治研究〉，《思與言》，第 44 卷
第 3 期（2006 年 9 月），頁 231-291。
- 劉曉鵬，〈敵前養士：「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前傳，1937-1975〉，《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2 期（2013 年 12 月），頁 145-174。
- 簡郁芳，〈一個新道途：中國研究在臺灣的發展－專訪國立政治大學副校長兼國
關中心主任林碧炤博士〉，《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第二期（2004 年 3 月），
頁 17-21。
- 關永中，〈謝勒知識社會學的背景－文化社會學〉，《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0 期（2004 年 5 月），頁 265-296。
- Chang, Chun-chieh, and Chien-min Chao, "Specialization without Autonomy: An
Informational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Permanent Committees in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forthcoming).
- Chen, Titus C. and Chia-hao Hsu, "Double-Speaking Human Rights: Analyzing
Human Rights Conception in Chinese Politics (1989–201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7, No. 112 (2018), pp. 534-553.
- Chung, Yen-lin, "The Witch-Hunting Vanguard: The Central Secretariat'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6 (June
2011), pp.391-411.
- Chung, Yen-lin, "The CEO of the Utopian Project: Deng Xiaoping'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ina Journal*, No.69 (January 2013),
pp.154-173.
- Chung, Yen-lin, "The Unknown Standard-Bearer of the Three Red Banners: Peng
Zhen's Role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ina Journal*, No.74 (July 2015),
pp.129-143.
- Dittmer, Lowell, and William Hurst, "Analysis in Limbo?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mid the Maturation of Reform," *Issues & Studies*, Vol. 38, No. 4/ Vol.
39, No.1 (December 2002/March 2003), pp. 11-48.

- Harding, Harry,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in David Shambaugh ed.,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3), pp. 14-40.
- Keng, Shu, Jean Yu-Chen Tseng, and Qiang Yu, "The Strengths of China's Charm Offensive: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a Southern Taiwan Town under Attack from Chinese Economic Power,"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32 (December 2017), pp. 956-981.
- Kennedy, Scott, "Overcoming Our Middle Kingdom Complex: Finding China's Plac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Scott Kennedy, ed., *Beyond the Middle Kingdo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hina's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King, Gary,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1, No. 3 (July 2017). pp. 484-501.
- Kou, Chien-Wen,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aiwan's China Studies: Trajectories and Dynamics," *Issues & Studies*, Vol.50, No.1 (March 2014), pp.9-53.
- Kou, Chien-Wen, "Xi Jinping in Command: Solving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 CCP-PLA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No.232 (December 2017), pp.866-885.
- Kou, Chien-Wen, and Wen-Hsuan Tsai, "'Sprinting with Small Steps' towards Promotion: Solutions for the Age Dilemma in the CCP Cadre Appointment System," *The China Journal*, No.71 (January 2014), pp.155-175.
- Lieberthal, Kenneth, "Reflection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a Field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Allen Carlson, Mary E. Gallagher,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elanie Manion, eds.,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New Sources, 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a Quarterl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43 (September 1995), pp. 692-696.
- O'Brien, Kevin J.,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in an Age of Specializ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0, No. 71 (July 2011), pp. 535-541.
- Perry, Elizabeth J.,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 *The China Journal*, No.57 (January 2007), pp. 1-22.
- Shih, Chih-Yu, and Chiung- Chiu Huang, "Preaching Self-Responsibility: the Chinese Style of Glob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2, No.80 (March 2013), pp.351-365.
- Tsai, Lily L.,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Issues of Political Sensitivity in Rural China," in Allen Carlson et al. eds.,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New*

- Sources, 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46-265.
- Tsai, Wen-Hsuan, "How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 was Operationalized in China: Methods and Procedures of Public Opinion Contro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 No. 101 (September 2016), pp. 731-744.
- Tsai, Wen-Hsuan, "Framing the Funeral: Death Ritual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 *The China Journal*, No. 77 (January 2017), pp. 51-71.
- Tsai, Wen-Hsuan, and Chien-wen Kou, "The Party's Disciples: CCP Reserve Cadres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a Resilient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21 (March 2015), pp. 1-20.
- Tsai, Wen-Hsuan, and Nicola Dean, "The CCP's Learning System: Thought Unification and Regime Adaptat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69 (January 2013), pp. 87-107.
- Tsai, Wen-Hsuan, and Nicola Dean, "Experimentation under Hierarchy in Local Conditions: Case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Guangdong and Sichua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18 (June 2014), pp. 339-358.
- Tsai, Wen-Hsuan, and Nicola Dean, "Lifting the Veil of the CCP's *Mishu* System: Unrestricted Informal Politics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hina Journal*, No. 73 (January 2015), pp. 158-185.
- Tsai, Wen-Hsuan, and Peng-Hsiang Kao, "Secret Codes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The Unknown System of Writing Team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14, (June 2013), pp. 394-410.
- Tsai, Wen-Hsuan, and Xingmiu Liao, "Concentrating Power to Accomplish Big Things: the CCP's *Pishi* System and Ope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6, no. 104 (March 2017), pp. 297-310.
- Wang, Ray, and Gerry Groot, "Who Represents? Xi Jinping's Grand United Front Work, Legitim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nsult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7, No. 112 (February 2018), pp. 569-583.
- Wu, Yu-Shan, "Theorizing on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Nine Contending Approach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9, No. 25 (November 2000), pp. 407-428.
- Wu, Yu-Shan, "Taiwa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China Journal*, No.53 (January 2005), pp. 35-60.